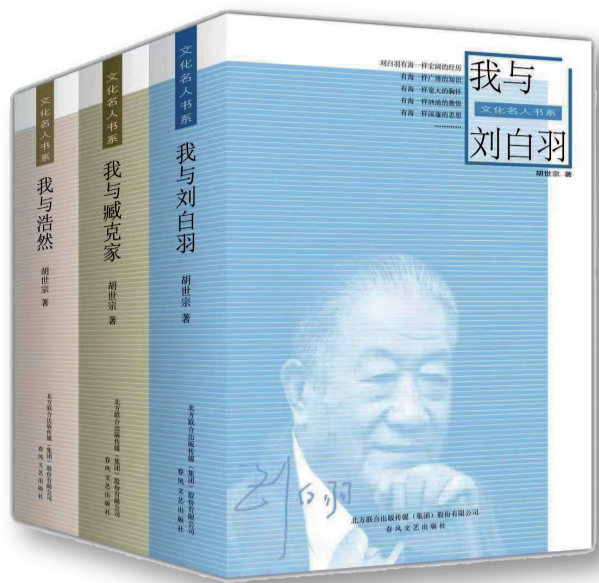


书 评

文学长征 纪传典库

□范咏戈



“文化名人书系”是世宗的一次“文学长征”。这套书的文字体量之大、图文并茂之珍贵,似乎不应由他一人完成,但又非他莫属。读他的巨著,我想起近年来西方关于记忆和回忆的讨论、研究渐成一门“显学”,而我国近年来也陆续翻译、出版了阿司曼的《文化记忆》和皮埃·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重提记忆、回忆之重要,原因在于随着“亲历”历史的一代人陆续逝去,人类的文化记忆不断受到挑战。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事件、情感只残存于一些“场”中,人类必须应对这种文化劫难。

近年来胡世宗为“记忆之场”不断奉上力作:继2006年、201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7大卷972万字的《胡世宗日记》之后,现在又有以《我与刘白羽》《我与臧克家》《我与浩然》等陆续问世的“文化名人书系”大书出版,正在或即将动笔的尚有他与李瑛、袁鹰、魏巍、张光年、张志民、贺敬之、柯岩、刘征、雷抒雁以及辽宁作家高玉宝、晓凡、刘镇、李松涛、阿红、刘文玉、张云晓等,有的是单人一本,有的是多人一册。这实在是我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文学界60年不辍笔的作家不多,胡世宗算得上一位,他太有回忆的资格了。几十年与文学前辈大咖的交往,尤其其他的崇师重友和坚持日记的习惯使他成为唯一能够写下这部当代文学“辅史”的作家。

契诃夫说“作家是上帝的选民”,那就是说作家应在人格上是出类拔萃的。《大英百科》“美学”条目也写道:“一切诗(诗的广义及艺术)的根基是人格,而人格最后是在道德上完成,因此一切诗的根基是道德意识,这当然不是说艺术家必须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或是敏锐的批评家,也不是说他必须是一个博学的模范或英雄,但他必须在思想与行动的世界里占一个份,这样才使他本身或是在旁人的同学中体验到人生的戏剧。”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很好的文学技能,但仍然不能成为大师或写不出大师级作品,原因之一在于创作主体缺少伟大人格,在内

心的拼搏、眼界的较量和襟抱的展示中输掉了人格。世宗深谙此理。他笔下的刘白羽、臧克家、浩然等等,首先都是“人格作家”。他的记忆首先是“人格记忆”。从中,读者可以感受刘白羽“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作家”的风范,他率师部队作上前线,在前沿主峰上,把总政文化部——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的担子交到接班的李瑛手上。了解臧克家如何把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比如他门上贴着自己写的对联“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而这位诗翁与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以诗会友”更有详细记述,诗翁一生尽做善事,他活到99岁,善良是

他身体健康最丰盈的营养。对于浩然,大多数读者不会有像对刘白羽、臧克家、张光年、魏巍、贺敬之、柯岩、李瑛等那么多的了解,而世宗却与他交往甚多,《我与浩然》填补了浩然研究的一个空白,从书中走出一个坚持扎根人民土地的“大地作家”的身影。“春江暖鸭先知”,浩然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他知道天下变化的道理,农民朋友了解他、爱护他,使他在人生和创作遇到曲折时没有沉沦,仍努力写出受人们喜爱的作品。正因为此,世宗这些回忆有很高的格调,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剑指了当下,引出许多作家对人格的思考。

由于世宗本人便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因此他的回忆堪称是“文学中的文学”。这套巨著能够做到体大思精又前目后凡,属辞比事又缘情体物,文字质朴而灵动,既奢华又昂扬,这种文学的记述让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世宗和一些大师、作家的交往,虽不直接评价他们的作品,但是通过以文会友的交往,人们对这些大师、作家的作品也获得一些理性的认识。这种质感和通透是读相对枯燥的文学史所无法获得的,可以称为“史中有诗”,是传记,是史料,更是学院派文学史不可或缺的补充。如刘白羽去萧红故居,到那里之后先不与一大帮领导打招呼,却从夫人手里拿过相机旁若无人,紧走几步,为萧红塑像拍了几张照,原来他年轻时就跟萧红有交往。在防空洞躲避轰炸,萧红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过他;又如臧克家喜爱中国女排,不顾年高体弱熬夜看电视播出的女排比赛;世宗和诗人李瑛交往几十年,通信多多,十分赞同谢冕对他这位北大同学的评价:李瑛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这套“历史的回忆”图文并茂,不仅对文学史具有文献的价值,也会引发读者对文学大师风范和文学流变的感受与思考,是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字。

《昨夜布谷》:

书写被遮蔽的上海

□甫跃辉

上海给人的印象几乎是恒定的。提起上海,不同地方的人们脑袋里很容易冒出这类词汇:都市、时尚、国际、怀旧等。人们大多还会想到这些地方:东方明珠、陆家嘴、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石库门、城隍庙、迪士尼……几乎任何一个重要的城市,都会被符号化,北京、南京等亦如是。有些尚未找到自身特点的城市或地方,为了宣传自己,也在寻求“符号化”。“符号化”容易导致一座城市被人记住,提起这城市,人们便想到那些高度符号化的东西。同时,“符号化”也会让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认知失于片面,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座高度符号化的城市,要想在人们眼中改变自身的印象,是异常困难的。

写作亦如是。上海的写作,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提到海派文学,心中往往只会想到某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和前面提到的那些名词相对应的。都市、时尚、国际又怀旧的海派文学,一天一天固定下来,对后来者的写作,既有强烈的影响,又有巨大的限制。这时候,那些同样书写上海,却并未被吸纳进这一“海派文学”漩涡的作品,就显得尤为可贵。而它们又面临着尴尬的境地,即很少有人提及上海文学时,会想到这样的作品。

《昨夜布谷》即是其中一例。《昨夜布谷》写的是小镇公务员的生态,以略带书生气的彭永生作为叙事者,勾连起六个相互可以独立的故事。作者彭瑞高在后记中夫子自道,这原本是六个中篇,先后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写作时间跨度达三年。将这六个中篇连缀成长篇,并非勉力为之,一气阅读下来,六个部分,确实能够整合为一。主人公彭永生既是这些故事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他的命运,在渐渐地发生着改变。

这些故事关系到中国当下最基层的政治生态,选举、驻村、村企的生存等等,乡镇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尽管纳入这些故事里,故事曲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譬如最后一章,在全镇选举之时,按照叙述的节奏,读者都期待着选举结果,然而,此时叙述者却抛开这一节不说,说到徐老师为了守护文物,死在了文物挖掘现场。这样的叙述方法,犹如园林中进门后设置一屏障,让故事丰厚精彩许多。

《昨夜布谷》不止故事纷繁,人物也很繁多。差不多每一章节,重要人物都在五六人左右,全书算下来,20多万字竟有重要人物三十来人。这在当下长篇小说中,是不常见的。这些纷繁的人物和故事,却并未使得这部小说显得喧嚣。作者精心设置了一个“布谷”的意象,让布谷鸟的叫声,出现在一个又一个改变人物命运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是寂静的,彭永生和别的人物,仿佛听到了来自命运深处的声音,譬如书中第三章,彭永生和秦杜鹏待在办公室里,在布谷鸟的叫声响起前,那寂静的时刻已经到来:“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办公室里空气凝滞而沉重。窗外有谁人家传来的广播声,正是《梁祝》里那段要死要活的小提琴独奏。大院里偶或响起匆匆的自行车铃声,还有传达室老丁咋咋呼呼的叫喊。平时常有一群群鸟儿在古樟树间跳跃,叽叽喳喳地烦人耳根,现在却鸟去林空。整个大院,难得这样安宁。”

很快,布谷鸟的叫声出现了。布谷鸟的叫声反复出现,成为整本书的背景音,成为这群乡镇人物的命运之音。

前文说过,这些乡镇的故事,在上海故事中是被忽略的。但这些故事的重要,并非仅仅在于它们补足了整体的上海故事。《收获》主编程永新在《昨夜布谷》研讨会上谈到,他不认为因为很少有人书写,乡镇叙事就在上海叙事中有了天然的价值。这是我深为赞同的,那为什么又说,上海的乡镇叙事特别值得书写呢?因为上海的乡镇故事,是如此贴近上海这个巨型都市,上海乡镇故事所反映的改变和焦虑是那么的触目惊心,其间人心的转变,也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那布谷鸟的一声声让人心惊的叫声,在提醒我们思考,面对这个时代剧烈的变迁时,人心和世界的走向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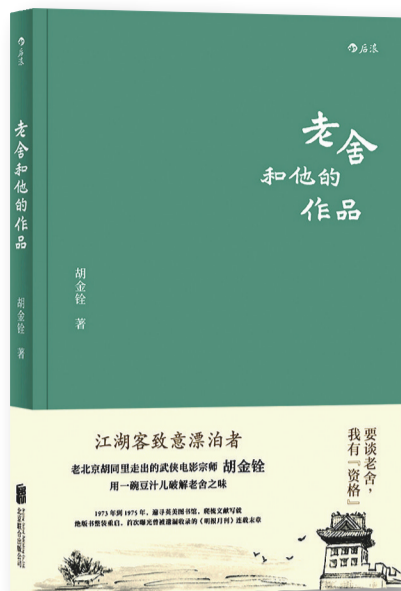
(《昨夜布谷》,彭瑞高著,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老舍和他的作品》,胡金铨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0月出版



在世界华语电影界享有新派武侠片宗师之誉的胡金铨(1932-1997),不只是一位电影导演,更不仅仅是局限于武侠片这一种类型电影创作的导演。美工和道具,是他入门影坛的本行。当演员和做编剧,则是他走向导演的前奏。除此之外,胡金铨还对历史和文学都颇有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支撑了他独具美学风格的多种类型、多种题材的电影创作,而且也转化成了好几本书面写作的成果。《老舍和他的作品》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本。

与胡金铨其他几本著作明显不同,《老舍和他的作品》一没有牵涉电影,二没有展示作者本人的经历,全部的内容都聚焦于书名所指的“老舍和他的作品”。按照今天通行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之为“一部关于老舍文学生涯的评传”。而这部评传的得来,又是因为旁人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谈老舍的文章,被胡金铨看出不少错处,《明报月刊》的总编辑胡菊人知道后,即邀请胡金铨来写老舍。于是,从1973年12月到1975年4月,时断时续,胡金铨在《明报月刊》发表了9篇评述老舍的文章。1977年,这些文章中的前8篇,曾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以《老舍和他的作品》为书名结集出版。如今在北京出的新版同名书,增收了当年《明报月刊》上刊发的胡金铨谈老舍的系列文章第9篇,算是这组文章首次合为全璧、完整成书。

原载于《明报月刊》的9篇文章,在书中编排成了30章。前后时间跨度约50年,从老舍出生的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公历1899年2月3日)起,到抗战胜利后老舍赴美访问止。或许是来不及写,或许是特意留下空白,自陈是带着想要了解老舍赴死真相的目的,写这些文章的胡金铨,并未把老舍人生和文学道路的最后十多年,纳入他对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这番谈论。尽管如此,老舍为人文的鲜明个性,在夹叙夹议、娓娓道来的30章里,已经得到了凝练、剖切的细致刻画和深入剖析。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始终坚持他在书前借用老舍一篇小说的标题作题目的自序“不成问题的问题”里所说的一条原则:研究老舍,要以看过老舍大部分的作品为前提,不能只看着老舍的小说和剧本就大发议论。

为了写这些文章,据说胡金铨自己花钱去伦敦大学的东方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现代中国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等地查阅了大量资料。在老舍研究的资料已有汇编出版的今天,《老舍和他的作品》在搜集和依托材料方面的苦心孤诣,似乎显得平淡了许多。但看看作者当年从全面的作品阅读和材料爬梳,特别是置身处地体察老北京小市民为人处世特点的心理共感中,提炼出来的一些见解,如:“老舍在很多书里都以‘北京人’做主角,描写得也确是入木三分,因为他自小在那种环境里长大,而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第二章)“老舍有个习惯,喜欢夸大自己的穷困。”(第十二章)“经过他这次亦庄亦谐的劝解,风潮终于平息了。其实老舍内心极痛恨学生闹风潮。在很多作品里都表现了这一点。”(第二十二章)都仍然有一种发人所未发的新鲜感。

《北平岁时志》,张次溪编著,高辰标点,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这本《北平岁时志》属于“北京古籍丛书”的新品种“北京岁时”系列丛书之一。与“北京岁时”系列中的其他两本书《燕京岁时记》《北平岁时征》同样,《北平岁时志》采用了简体字横排本的形式。这也是“北京岁时”系列作为“北京古籍丛书”新品种的创新之处。在今已仅60年的出版历程中,“北京古籍丛书”陆续推出了80多种有关北京史地文献的古籍图书,其中,内容离百姓日常生活最近、读起来也比较轻松有趣的,莫过于记载岁时传统的一类。

所谓“岁时”,就是年年岁岁周而复始的节日和时令习俗。不过,正像“北京岁时”系列三书的前言所述:“说起‘岁时文化’,很多读者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欢欢喜喜过大年’,或者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上去。当然,过年过节是传统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北京岁时文化的范畴与内涵,要远比过年过节丰富得多。您翻开这三本书中的任何一本,都会发现:‘哎呀,北京人把那些非年非节的日子,居然也过得这么有滋有味!’”

换句话说,岁时传统的核心,是贯穿在节日和非节日之中的一整套地方风俗和社会习惯。岁时传统中,既积淀着一个地方人们适应或利用特定的自然生存环境和物候条件的群体经验,也表现着从历史延续发展而来的某些与外在的生活仪式紧密相连的精神信仰和观念定势。因此,完全可以说,岁时习俗看似浅显而内涵厚重,表面上好像只不过是一套年年因袭的时令讲究,实际上却相当于整个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个宏阔的横切面。

《北平岁时志》的编著者张次溪(1909-1968),原籍广东东莞,少时随父母来北京居住,从青年时期起,就受家学和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民俗研究一派潮流的影响,潜心致力于北京民俗和史地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编纂、保存,是现代历史上北京民俗和城市史地文献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平岁时志》是他在1936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大体上依循了古来岁时记的寻常体例,逐月成卷,卷内顺日次先后,分列条目,引述各种文献中关于北京岁时习俗的记载。相较于旧体岁时记多出来的是,每一卷开篇,还有一篇作者撰写的概述本月时令习俗的专文,梳理各路文献脉络,勾勒时令习俗流变,一直归结到晚清民国之际的情形。

书者话书

自由地选择传统 自由地选择仇敌

《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戴潍娜

□戴潍娜

我的爷爷是个书痴,一辈子挨奶奶训,皆因他是个“书呆子”。年过80,日日还如赶考书生般,一笼笼管子、庄子、黄帝内经、中华道藏……从书架、床头一路摆到阳台上去了。一天,他问我,博士论文写完没,我说早呢;问还需多少字,至少10万吧。大惊,正色道:“写这么多谁有工夫看!”随即拍胸担保,“绝没有人看!”我想,爷爷你对我真有信心。半年后,我论文仍未写出,爷爷劝我随便点,一旁奶奶喝道:“那怎么行!”奶奶读书亦恨书,常数落爷爷的头条罪状:饭饱了碗还没丢稳就急着捧书去。这一回,轮到奶奶和我严肃探讨,“博士论文还不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待你百年之后,别人翻时……”我立刻打断她,奶奶你对我真有信心……亏了爷爷奶奶这些年里的哄惯,我可以一直毫不羞耻地当一个“老学生”,从事一桩枯燥的趣味。

金圣叹评才子书曰:“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我辈此等破道破治之妄作,岂不是杀头的罪。惊惶之余,只祝愿自己花费青春建筑的不是垃圾,有一些学术和文学上的叛逆与意义。读博4年,最要感谢的是恩师孙郁先生,他身上的魏晋名士之风,涤荡了圈内的陈弊与腐气,让我在一个“假天下”里见识到了“真人”。博士入学之初,孙老师就为我设计了作家兼学者的道路,希望学术研究不要伤害到我的诗歌和戏剧创作。4年的时间,孙老师亦师亦父亦友,在我学术和人生的重大问题上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博士论文,孙老师从最初选题到研究思路、学术创见等方面提点指导,并最大限度地赋予我自由,去逃脱学术八股与腐气,让我得以在论文写作中,自由地选择传统,自由地选择仇敌,并为之奉上我毫无虚情假意的全部的殷勤。

这本《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戴潍娜》,就是由这恣意妄为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事实上,在写作之初,我心中先有了一部书的影影绰绰的原形,它天然地站在了论文体的反面。书里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戴潍娜,他们极具辐射力的性情,也自然而然影响了这本书的调性。

1944年,周作人发表《我的杂学》一文,此文共分18个标题,堪称周作人的十八般兵器,计有: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戴潍娜的思想,医学史和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川柳、落语、滑稽本,俗曲、童谣、玩具图,外文与译书,佛经与戒律。杂学是周作人终身的读书追求,他曾言“思想宜杂,杂则不至于执一”。作为自始至终的自由主义者,周作人如数家珍般一一罗列他喜欢的书,甚至“只足供给要攻击我的人,知悉我的据点所在,用作进攻的参考与准备”。由此戏诸的话,足见他对文章和学问的看法,乃至诚最爱,谋生仅仅是捎带着的事情。

在其开列的杂学清单中,“戴潍娜的思想”赫然在列。事实上,十八杂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医学史与妖术史”“儿童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都与这位维多利亚晚期的博物学家直接相关。称戴潍娜为周作人最重要的精神导师毫不为过,周作人本人也同时作为戴潍娜最重要的中文译者而存在。

1918年,周作人第一次引译戴潍娜,此后终身宣称自己为戴潍娜的私淑弟子。民国初兴的性心理学、女权解放运动都是周作人一手肇始。戴潍娜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周作人不为人知的内在精神,洞悉其生活的艺术。这个终身在线装书里的“活古人”,他的悲剧逐步演化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悲伤剧幕。“人究其本质不过是一个语病”,现代中国社会则是一则巨大的语病。隔着无际时空的戴潍娜,站在周作人这个“语病”背后,如同那个告解室里静静聆听的精神分析师,揭秘其隐秘的内心生活。

民国时期,拜于戴潍娜门下的远不止周作人一人。作为性心理学研究的巨擘,学界虽对戴潍娜有所褒贬,然民国以降,译介而来的戴潍娜著作几乎得到一致的推崇。戴潍娜新作的每一次出版,都会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一定的反响,如《性心理学》初版于1933年,潘光旦于1939年即开始翻译。

若论戴潍娜改变了谁的人生,恐怕还是周作人、潘光旦等人,以及施蛰存、周煦、胡风等名家。理解戴潍娜需要渊博知识和西学底子,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毕竟,唯真才识得真才,唯真色不妒真色。

大概戴潍娜的学问和他的情爱一样,是慢热型的。然一朝发动,则连绵不绝如沐春风,影响缓慢而久远。戴潍娜未曾一夜蹿红,也绝不会轻易过气。他在文艺界的动静,如风和日丽的大海上的浪花般平静,却随时有可能孕育出天风海啸。

永远会有读者因戴潍娜而思路大开,拥抱新的文明和文化。他靓丽的思想,如永动机般更新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边界。戴潍娜在文学、思想、哲学、科学、文艺理论等方面的巨大金矿,至今仍可谓是一块处女地,需吾辈付之最敏感同时最热烈的神经加以对待。

(《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戴潍娜》,戴潍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